

陶渊明的躬耕之路与相关诗歌创作考论

李锦旺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陶渊明少有壮志,也曾游宦多年。但是他对晋末官场的不适,前代隐者躬耕传统的感召,最终促使他解职归田,过上躬耕自足的生活。陶渊明的躬耕之路大体可分为耕仕徘徊期、安心躬耕期与老病困穷期三个阶段。在漫长的躬耕历程中,他认识了躬耕的意义,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但也饱尝了战乱、自然灾害与饥寒等方面的困扰。这些经历他都真实地反应于诗歌创作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

关键词:陶渊明;躬耕;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2)05-0093-05

A Comment on Tao Yuan-ming's Farming Life and Related Poetry Creation

LI Jin-wa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had great aspiration since early youth, and also served as an official away from home in many years, but he could not adapt himself to the officialdom, and was deeply attracted by the farming life the previous hermits, which finally led to his resignat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He lived by his personal plough ever since. Tao Yuan-ming's farming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hesitating between farming and official career, keeping his mind on farming and his later years with illness and poverty. 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 farming practices, he recognized the meaning of farming and enjoyed his idyllic life, however he was also puzzled by war, natural calamity, hunger and cold. He responded to all those experiences in his poetry writing, thus building a complete self-imag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farming; poetry writing

陶渊明与谢灵运都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在诗歌史上亦并称“陶谢”,但他们的人生道路与诗歌创作却有着鲜明的差异,这绝非偶然。陶渊明在决定归田躬耕之后,常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二)而自励,终于成为中国田园诗的鼻祖。但是谢灵运“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父祖给他留有“故宅及墅”,使他得以“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清幽山居的体验使他为山水诗的奠基者。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陶渊明选择躬耕之路对于他的诗歌创作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陶渊明躬耕的动因

(一)前代隐者躬耕传统的感召

陶渊明号称“千古隐逸诗人之宗”,出现在他

诗文中的历史人物,数量最可观的便是被他引为知音的各类隐者。先贤的往事懿行召唤他走上了归田躬耕的道路,也激励他在漫长而寂寞的躬耕之路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坎坷与磨难。

作为一个不愿介入世事纷扰的群体,隐士固然保持了自我的独立与清静,但同时也面临如何谋生的现实问题。在小农经济时代,他们的选择空间毕竟是有限的,采药、渔猎、经商、讲学都是可能的备选方案,但躬耕自食可能是一条最为务实的路子。如《论语》中所载的长沮、桀溺、荷蓑丈人,不仅视农耕为其本分,而且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食者表示不屑。东汉时代,严子陵不应光武帝之招,“耕于富春山”(《后汉书·逸民传》)。梁鸿夫妇也曾“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后

收稿日期:2012-05-01

作者简介:李锦旺(1971-),男,安徽金寨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汉书·逸民传》)。汉魏之交的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馀家”(《三国志·魏书十一》)。两晋昏君相继,隐者尤多。徐苗“少家贫,昼执鋤耒,夜则吟诵……乡邻有死者,便辍耕助营棺槨”(《晋书·儒林传》)。范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晋书·儒林传》)。范宣“家至贫俭,躬耕供养”(《晋书·儒林传》)。朱冲“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晋书·隐逸传》)。谯秀“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晋书·隐逸传》)。而在陶渊明的家乡浔阳,甚至还出现翟汤、翟庄、翟矫、法赐四代相继,“耕而后食……隐于县界南山”的隐逸世家(《晋书·隐逸传》)。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战乱频仍,灾患相继。其家乡所在的江州处战略要冲之地,又是社会矛盾交汇多发的地带。他之所以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走上躬耕之路,如果没有先贤们千百年来留下的躬耕经验与文化传统,那是很难想象的。

(二)对仕宦的厌惧

陶渊明少壮时期潜心儒学,颇有兼济天下之志。“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都是少年心事的流露。他也十分渴望有朝一日得以君臣遇合、乘时而为:“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九章·屈贾》)“时来苟冥会,踟蹰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为实现少年壮志的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也在耐心地等待时机。然而桓玄、刘裕集团为觊觎帝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剪除异己的军事斗争与篡弑相继的政治乱伦行为,不仅与他所憧憬的黄虞之治背道而驰,也让他对政治集团内外的杀机四伏与凶险莫测充满了厌恶和畏惧。因此,由仕反农乃是他必然的选择。“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就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陶渊明的曲折躬耕之路

然而与他的前辈相比,陶渊明的躬耕之路似乎要来得艰难曲折得多,大体可分三个阶段论述。

(一)耕仕徘徊期

以义熙五年(公元405年)辞彭泽令为界,此前属于陶渊明在耕仕之间徘徊不定的阶段。陶渊明何时参与农事,他本人的诗文与有关史传所载均有含混之处。其《饮酒》诗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

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向立年”大约二十八、九岁的光景,他于此时“投耒去学仕”,则在此之前已经亲历农务了。但《宋书·隐逸传·陶潜》则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陶渊明于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起任江州祭酒,时年二十九岁,正合于《饮酒》“向立年”之数,但《宋传》却把他躬耕的时间定在解职祭酒之后,与《饮酒》又恰好相反。可是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中,他又叙述说:“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晋安帝元兴二年癸卯(公元403年),陶渊明已三十九岁,揣诗意,他此前并未亲践农事。真实的情况或许是,二十九岁(或更早一些)至三十九岁之间,他不过偶预农事,与后来那种“颇为老农”(《有会而作·序》)式的体验还有较大距离。

晋安帝隆安年间,野心勃勃的桓玄乘势崛起,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三月,朝廷被迫“进玄督八州及扬、豫八部诸军事,复领江州刺史”,陶渊明约于本年加入桓氏幕府。次年冬,生母孟氏卒,陶渊明返家服丧,重预耕刈之事,《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即为明证。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五月,玄众迅速溃败,玄亦被斩。本年陶渊明转而加入刘裕幕府,任镇军参军。次年入刘敬宣幕府,任建威参军,但敬宣迫于刘毅的强势排挤,不久“自表解职”,陶渊明亦还家。经家叔举荐,同年八月任彭泽令,但在任仅八十日,即抱着决绝的姿态卸任归田。

粗略算起来,陶渊明在耕仕之间徘徊犹豫了十几个年头,最后才决志归隐。本阶段陶渊明一方面创作了少量的躬耕诗,同时在游宦期间的行役诗中,也流露了向往归耕的意愿,如:“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於规林诗二首》其二)“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可以看出,他踏上归耕之路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二)安心躬耕期

大约辞彭泽令稍晚,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对前期的徘徊迷茫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彻底结束了微官薄禄的游宦生涯,虽然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著作郎,但被他拒绝。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辞彭泽令,到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赋《丙辰岁八月下渚

田舍获》，前后长达十一二年。在此期间，陶渊明参与了众多农务，如开荒葺宇、种豆采菊、灌园摘蔬、耘耔刈稻、汲水负薪，等等。随着躬耕体验的持续深化，他的农耕诗与相关题材的诗歌创作也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三）老病困穷期

大约从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起，陶渊明不幸身染痼疾，在《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中，他描述了自己颓丧的心情：“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这次顽疾久治不愈，直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诗人与世长辞。颜延之追忆云：“年在中身，痼维痼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禱祀非恤，僦幽告终，怀和长毕。”（《陶徵士诔》）疾病的困扰，加上年事已高，他在人生的最后十来年中大约仅从事“灌畦鬻蔬，织絢纬萧”（《陶徵士诔》）之类体力较轻的农务。在人生的艰困晚境，他创作了《咏贫士七首》、《乞食》等诗，嗟叹困穷与守志固穷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

三、以躬耕体验为核心的诗歌创作

先秦以来的隐者，虽然也曾偶尔留下过片断的歌谣，但却还从未有人像陶渊明那样以诗歌艺术的形式全面而细腻地披露一个隐者复杂而鲜活的躬耕体验。

（一）躬耕的意义

先秦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对农耕圃艺持鄙视态度。樊迟学稼、学圃，被孔子骂为“小人”（《论语·子路篇》）。孟子与农家学派论战，也把“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区分得很清楚（《孟子·滕文公上》）。陶渊明虽然少习儒经，但却基于我国农耕传统与自己的切身经历，打破了儒家的偏见，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民以食为天，与其拘泥于安贫乐道的古训，不如躬耕自养、勤劳持家来得实际。并一再强调：“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之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获早稻》）

陶渊明不仅抒写了个性化的躬耕体悟，还创作了一首颇具“官方”色彩的《劝农》诗，对躬耕的意义作了最为全面的颂扬。袁行霈先生认为这首诗作于陶渊明任职江州祭酒期间^[1]，不无道理。《宋书》卷四十《百官下》云：“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其中仓曹，“主仓谷事”^[2]。陶渊明履职江州祭酒为时甚短，关于其他诸曹，不

见一诗涉及，但对仓曹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劝农》一诗以六章的篇幅历叙躬耕之必要。前二章追溯农耕历史的起源，肯定上古圣人（舜、禹）躬耕稼穡、垂范后世的优良传统和周代以食为首的施政方略。第三章描绘了一幅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风俗画，在春风和煦的季节，原野上百花盛开，草木欣欣向荣，成群结队的士女们抓紧农时、竞逐农事。第四章以中古“贤达”（冀缺、沮溺）尚且躬耕垄亩的事迹反形当下众庶自命清高、不屑农事的世俗观念。第五章归结当下，强调立足民生、勤于农事的现实意义。末章与第四章相呼应，对那些本无才德，却企图以追崇先儒（孔子、董仲舒）为借口而逃避农耕的士人进行了委婉而机智的嘲讽。全诗把深厚的历史传统与强烈的当下关怀融为一体，古今贯穿，破立结合，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浸透于字里行间，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二）躬耕的乐趣

1. 属意丘园，娱情写志

与晋末那些“充隐”（如皇甫谧）、“通隐”（如周续之）之类的假隐士不同的是，陶渊明是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回归心态栖居田园的。“性本爱丘山”的禀赋与“虚室有余闲”的长期涵养，培育了他天人合一的哲人胸襟与感通万物的审美情趣。无论巍如高山，秀如松菊，还是动如飞鸟，陶渊明都能以“万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悦纳心态而百赏不厌，由此创作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诗歌意象。

（1）山意象。“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时运》）“和泽同三春，清凉华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二）春山、秋峰，各具情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更是山花人鸟，一片化境。

（2）松菊意象。“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诗二十首》之八）“芳菊开林耀，青松冠严列。怀此真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诗二首》之二）二诗中的松与菊，显然融入了诗人自己卓犖不群的人格情操。

（3）鸟意象。“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恰，翩翩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归鸟》）“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之五）“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之七）“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

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以上“羁鸟—归鸟—栖鸟”系列意象,十分形象地寓托了陶渊明在由仕而隐过程中的几次重要的心态变化。

归鸟、秋菊、孤松都是陶渊明归隐躬耕之志与坚贞品格的隐喻与象征,最具鲜明的个性色彩与含蓄隽永的审美意味。它们不仅在玄言诗泛滥成灾的东晋诗坛如空谷足音,即使在整個中国诗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垂范后世,至为深远。

2. 耕读相兼,诗书自娱

在平淡的躬耕岁月里,陶渊明努力做到了自然、生活与艺术的统一。在农耕之余,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艺术欣赏与诗歌创作。“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飏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如果说躬耕满足了他与家人的口腹之需,而琴书则充实了他的心灵世界。这种耕读相兼的生活方式,陶渊明一直坚持到了晚年,这一点从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所作的《答庞参军》(五言、四言各一首)中可以略见一斑。虽然此时他年事已高,且又“抱疾多年”(《答庞参军·序》),但耽玩琴书的雅兴未尝稍衰:“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我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在耕读之余,陶渊明亦饮酒赋诗,即兴自娱。其《饮酒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正是基于这种自娱的创作观,他才如实地展示和披露了自己的本真个性与情趣。《饮酒》其七、其八中的松菊,已如上述。在其九中,诗人丝毫不为“田父”说词所动,坦言“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相对而言,《饮酒》其五中诗人的感悟要含蓄得更加深永一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联,被王国维作为“无我之境”的范例之一。菊寓深意,人多知之。而于南山,则向有忽略。联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则此南山实系飞鸟之乐园。飞鸟归山之乐,不也隐含着诗人的洒脱自得么?只是这一“真意”,远不及“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那么直白而已。

耕作郊野,登山临水之际,也是他诗情勃发的良机。“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

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上文各类诗歌意象就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感知、提炼出来的。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充实了陶渊明的闲暇人生,也成就了他在诗史上不朽的地位。由此可以明白《杂诗十二首》其中一中看似矛盾而实相统一的生活态度:“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基于人生短暂现实,他认同晋人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但是他又非常自我节制,并惜时自励。其死后之所以谥为“靖节”,原因就在于他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

(三)躬耕的苦衷

陶渊明的躬耕生活虽然有如上诸多好处,但也长期面临一些他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持续不休的战乱威胁、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令他不平的贫困,以及对于家人的愧疚等,这些现实问题困扰了他的后半生。

1. 战乱的威胁

陶渊明归田之时,他的家乡并不宁静。由于江州处战略要冲之地,这里先后上演了桓玄同盟的内部火并、桓玄集团与刘裕集团的厮杀、围剿卢循的战争,以及刘毅集团与刘裕集团的决战。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江州都督刘毅在上表中不无忧郁地指出:“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财殫力竭,无以至此。”(《晋书·刘毅传》)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裕到达江陵,也在下书中深表忧虑:“江荆凋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凋残之余,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政道。……近因戎役,来涉二州,践境亲民,愈见其瘼,思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宋书·武帝本纪》)从桓玄于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主盟浔阳,到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裕讨灭刘毅,江州一带战事持续了十四五年之久。归田之后不久,陶渊明在诗中描写了亲眼目睹的家乡荒凉状况:“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五首》其四)昔日人口聚居的村落,而今已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里的人“死没无复馀”?上引刘裕、刘毅的书、表以可靠的

史料提供了的答案。

2. 艰辛的农务与饥寒的困扰

本来，陶渊明入仕的动机之一就是解决饥寒问题。颜延之《陶徵士诔》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又《饮酒》诗曰：“畴昔苦长饥，投未去学仕。”然而陶渊明断断续续转历数职，却始终难以融入晋末官场。他深感“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归耕念头逐渐占据上风。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两害相权求其轻，最后终于作出了“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的选择。

陶渊明摆脱官场羁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微薄的俸禄，一旦归田，他就必须承担起艰辛的农务，必须承受难以逆料的饥寒之困。对于前者，他似乎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朝出暮归的劳作，夕露晨霜的侵犯，四体疲惫的感受，他都一一坦然面对。然而对于后一问题，他就没有那么自信了。中国小农经济自古以来就有其先天的脆弱性，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突随时有可能将一个普通小农之家拖入令人恐惧的深渊，陶渊明同样没有幸免于难。在《有会而作·序》中，他描述自己大灾之年青黄不接的艰难处境：“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躬耕的真实处境告诉后人，因此诗中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他曾一一回顾自己所经历的种种灾患：“为火屡焚如，螟螣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火灾、虫灾、水灾接踵而至，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家沦落到了“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之二）的地步。为了生存与养家，他不得不接受必要的馈赠，如江州刺史刘弘、友人颜延之对他都有可观的接济（详《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

3. 对家人的愧疚

陶渊明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显然是十分务实

的，他一再表白心迹曰：“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但是当饥寒真正来临，他又深感无可奈何：“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十二首》之八）躬耕未替而寒馁交至，幼稚盈室，嗷嗷待哺，他不能不在诗中流露出深沉的感伤情调。

陶渊明选择了躬耕独善的道路，却使整个家庭陷入困顿之中，他为此对家人怀着深深的愧疚：“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七首》之七）可是其妻翟氏有时仍难以抑制不满的情绪，这更加深了他的心理负担：“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之二）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再申内心愧疚：“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在疟疾与饥寒的双重折磨下，陶渊明感到来日无多，因此郑重撰写此文以陈心迹。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死前遗言，把一个丈夫、慈父的内心纠结再次真实地呈现在家人与世人面前。

从上文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躬耕生活对他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给他带来的自由与快乐，并创作了一批典范的恬淡优美的田园诗。同时伴随躬耕而来的重重困扰也给他的人生增添了不少遗憾。令人钦敬的是，陶渊明既没有把自己的人生一概美化为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曲，也没有讳言与掩饰内心的孤独与苦闷。从这一角度而言，他是一位至真至诚的诗人，他用自己的天才诗笔真实地勾勒了曲折而坎坷的躬耕历程，也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36.
- [2] 邱树森.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Z].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126.